

悉的道光咸豐時期內憂外患的情況，認為清廷當時缺乏力量繼續重視民族學。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更深刻地研究內在的原因，比如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漢族在貴州的殖民方略在 19 世紀已經基本上鞏固；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清廷鼓勵學者把民族學研究和注意力轉向別的民族——西方人。

讀完這本書以後，我認為，我們未來還有許多有關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此書以政府代表的立場和行事為主；如果我們從漢人移居者的角度看問題，會不會發現其他與清廷官僚不同的動機和傾向呢？另外，我覺得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是：研究歐美殖民方略的學者經常強調歐美殖民者把本地人「異國情調化」，在介紹她所搜集到的苗蠻圖時，作者對此有所觸及，但仍有待繼續探索。譬如，苗蠻圖中男女混雜或赤足婦女的場面，對當時接觸苗蠻圖的[男]漢人來說，會否有「色情畫」之嫌？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對於對中國清代帝國建構事業，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和清代文獻感興趣的學者，均屬必讀，值得細嚼。

麥哲維 (Steven B. Miles)

(美) 南伊利諾大學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y LISA ROF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xvi, 330 pp.**

麗莎·拉弗 (Lisa Roefl) 是美國人類學家，1999 年她出版了《其他現代性——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性別嚮往》(*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這是基於她在杭州的一家紡織工廠中的長期田野研究寫成的。在拉弗的視野中，歷史並不是過去之事，它存在於現時之中，一方面是過去的秩序在空間 (space) 上延續，另一方面是在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延續。

拉弗按照「政治代別」(political generation)，大致以年齡為界劃分了三代女工：解放前後參加工作的女工、文化大革命時期參加工作的女工以及 1978 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女工。她注意到，不同時代的女工在身份認同上有很大的差別。在姿勢 (gesture)、語言 (word)、修辭策略 (rhetorical strategy) 和敘事上，三個群體內部成員很相似，而群體之間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互相排斥。比方說，解放一代女工經常談論自己英雄的勞動功績，貶斥文革一代的「懶惰」；而文革女工經常不服從權威，跟領導大發雷霆，當然她們也會在上級那裏爭寵，告狀說老一輩的工人如何如何不好。而與此截然不同是文革之後參加工

作的女工，她們對前兩代的女工所熱衷的事情似乎漠不關心，她們更加注重打扮，特別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不用再上班，在家專心相夫教子——她們想要做真正的現代女性。

應當說，這些觀察是相當有洞察力的，不同代別的女性的身份認同，尤其是性別角色方面認同確實有著相當大的差別。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何在呢？拉弗將其歸結為不同時代的社會空間的影響。

解放前的社會空間最重要的是「內/外」之別，在這樣的分類體系中，男人在外，父系傳技。婦女要在「內」，呆在家裏而不可以到紡織作坊裏工作，否則會被社會打成另類，貼上「破鞋」等等恥辱標籤。隨著革命的來臨，這些標準被黨的另外一套分類體系所取代，即家庭/勞動的二分。新的話語認為，「勞動」是人的價值的唯一尺度，但只有在國有的工廠裏為國家生產才算「勞動」，如果在家庭內部就不算。原來的「內/外」之別被當作「封建牢籠」、「傳統」、「壓迫」的代名詞。此時，本來未區分高下的「內/外」之別，猛地被賦予了絕大的意義：從家裏走出來，意味著解放。革命的二分圖式動員了眾多不滿者，並借助她們的力量很快將自身普及於所有社會成員的頭腦之中，這種力量如此之強大足以使任何持反對意見的人失語（如第 81 頁 Lou Shengzhi 的故事）。文革時代參加工作的女工並未經歷過內/外有別的時代，她們所處的是一個信仰權威政治的社會空間，而且與老一代的順從權威形成對照的是，她們身上閃現著極為明顯的「造反」精神。

文革之後的女工又如何呢？她們沒有經歷「文化大革命」，更沒有經歷過「解放」，在她們看來，努力奮鬥、踴躍勞動對於一個女性毫無意義，她們也無意與權威進行對抗，因為她們感興趣的事情不在於「勞動」和「權威」，而在於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女性。

作者認為，文革之後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性別問題上，「女性」不再由勞動或者權威來定義，而以「主內」（interiority）為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家庭/勞動來定義「解放」的話，此時的方向是完全與解放時期相反的：解放一代認為從「家庭」走向「勞動」是解放，可是到了改革開放這一代，則認為從「勞動」走向「家庭」是解放。當然，新的性別認同盛行起來，但並不意味著原來的認同標準消失了，在訪談中發現，老工人們還是認為她們獲得了「解放」。事實上，持有不同的性別認同的女工們共同存在於同一個社會之中、同一個工廠之中。

拉弗認為，性別意識的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決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它是由社會打造（socially made）的。「指責共產主義壓制人性、毛澤東時代阻礙

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阻礙了中國人表達人的自然性」，這在 1978 年之後一段時間裏，成為話語空間中的主旋律。文革以後，公共空間複雜化，電視、雜誌、電影中的故事，紛紛表達著所謂「自然」要求。這種解放的欲望與西方的思潮一起構建了一種「自然化」(naturalization) 運動。作者指出電視連續劇《渴望》、電影《活著》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時，這種大眾話語空間得到了國家及其代理人積極推廣，於是這樣的氣氛在全社會得到了充分的張揚，這使得中國人充滿了全球化的現代性想象，對個人起到了重大的影響。在她所調查的工廠中，Xiao Ma 在 1986 年是一個車間的監督員，1991 年作者再到工廠調查的時候，她不但已經結婚生子，而且幾乎放棄了原來的那份工作，也不打算再找甚麼別的工作，只想著相夫教子了。

作者認為，所有這些，包括文化、社會和政治的設置，構成了一個規劃 (project)。這種規劃並不是 1978 年之後才有，解放、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規劃。所謂規劃，更多是文化意義上來談的，它經過了人為的設計，而且其模板來自於歐洲的社會理論。

這種規劃還有很多具體的技術手段。如在 1978 年之前，貼政治標籤、開訴苦會、批鬥會等壓制手段，還有獎勵先進、開表彰會、電影宣傳等激勵手段。相比之下，改革開放以後，隨著公共空間的擴大，權力技術更為複雜和精細。無疑，電影、電視、報紙等媒體的重要性凸現出來了，但是微觀層面的手段也很重要。例如她觀察到，在工廠中為大齡女青年找對象成為工會的一項重要工作；計劃生育部門日益重要等等，這也是文化的工程的重要技術手段。換句話說，女工們的現代性，是從治理術的反復無常的規劃 (project)、教育和科學管理中塑造出來的，這使得主體呈現出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特質。

在此基礎上，拉弗認為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追求現代性的歷史，從 19 世紀的反殖民主義戰爭以來，追求現代性 (modernity) 就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主題。當然，現代性決不是某種神秘表述，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感受到它的存在，甚至在不知不覺中建構著它。現代性在指導著發展的規劃，引領著政府官員、知識精英、底層工人、農民和婦女，而所有的人也都在默默地接受著它。

但是，拉弗敏銳地發現，在「現代化前進」的旗號下，現代化本身的具體含義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而且與西方的現代化本意似乎也有很大的不同。這種現代性最大的特點在於它的不穩定性。中國的現代性既不是純本土的，也不是純外來的，而是在努力追求西方的物質和道德水平的過程中，連續不斷解釋、連續不斷替代的過程。在這個永不停息的過程中，中國精英包括領導人承

諾要擺脫落後，並在世界事務中發揮作用，與此同時實現了統治。於是，對現代性的追求本身就成為權力施展的舞臺。

拉弗認為中國的現代性是「其他現代性」，這是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比較而言的。或許是因為，她面對的是英美讀者，所以並沒有著力交待與「其他」相對的「一般」現代性到底意味著甚麼。但是，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現代性在歐美不會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構成要素；而在中國，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成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基礎，也是日常控制得以實現的技術基礎。

總之，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拉弗沒有從抽象的制度入手，而是仔細觀察普普通通的女工的工作、生活，言行、舉止，深入研究她們的身份認同。她找到了一個捕捉歷史的巧妙的角度，即比較三代女工之間的差異，使歷史變得可以觸摸，這可能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

李錡金
清華大學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By STAPLETON, KRIST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xii, 341 pp.**

司昆侖(Kristin Stapleton)這部著作以晚清到 1930 年代成都的城市改革為主題。過往對 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城市變化的研究，大多著眼於沿海省份的城市、租界(特別是上海)或國家首都。此書把注意力轉移到成都這個內陸城市，展示了晚清到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巨大變化，不單發生於與西方力量接觸頻繁的沿海租界，同時也出現在中國的內陸地區。此為這部著作的重要貢獻之一。

此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是成都作為四川省會的地理及行政架構的基本介紹。第二至第四章分析晚清「新政」，尤其是警察制度的推行。第五至第七章則敘述辛亥革命至 1930 年代的政治變化(包括清政權倒台後哥老會的興起，和軍閥混戰帶來的不穩定)，以及楊森及他下台後的「市政」改革。最後一章則總結這些政策為成都帶來的變化，同時比較成都與其他如上海、廣州、北京等大城市的改革不同之處。

作者認為在成都從清末至 1930 年代的城市改革中，最重要的兩個階段是 1900 年代的「新政」及 1920 年代的「市政」改革。作者以這兩個階段的主要改革者(即「新政」時期曾先後出任警察局總辦及勸業道總辦的周善培，以及「市政」改革時期的軍閥楊森)的改革措施，來帶出兩個時期的改革重點及相異之